

衝出封鎖線？

伊朗與「什葉新月」勢力之建構

Ir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ia Crescent

崔進揆

壹、前言

昔日的伊朗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波斯（Persia），在人類歷史上有著輝煌的過去；今日的伊朗，亦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則可以追溯自 1970 年代末的伊朗革命。在 1979 年的革命中，政治立場親美的巴勒維（Pahlavi）政權遭到革命勢力的推翻，宗教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領導伊朗，成立了遵循伊斯蘭教法（Sharia）的政治體制。自此，伊斯蘭學者成為伊朗最高的政治領導權威，國家營運和重大政策皆須獲得伊斯蘭學者所組成的專家議會（the Assembly of Experts, AOE）來認可，方能順利推動。

革命後的伊朗政局並不穩定，除因 1979 年 11 月至 1981 年 1 月的美國使館人質劫持事件，長期遭受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孤立與制裁外，在 1980 年代又和鄰國伊拉克因邊境領土糾紛而爆發了嚴重的武裝衝突。兩伊戰爭持續近 8 年之久，無數軍民在戰爭中死傷。除了獨特的政治體制，不同於順尼伊斯蘭（Sunni Islam）阿拉伯國家，伊

朗在宗教上奉行什葉伊斯蘭 (Shia Islam)。宗教的認同與歸屬問題成為伊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關係時而緊張，時而對峙的重要因素。順尼阿拉伯國家指控伊朗試圖對外輸出革命，影響他國內政；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譴責伊朗支持特定恐怖主義團體，並企圖發展核武器及彈道飛彈，不僅威脅中東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更影響國際秩序至劇。

現今，伊朗除因恐怖主義和核子計畫仍遭受國際社會的制裁外，在區域內又捲入敘利亞和葉門的內戰，以及伊拉克的戰後重建與庫德族人的獨立建國問題。這些問題看似各自獨立的個案，實則反應了中東地區深層又複雜的種族、文化和宗教問題，亦與伊朗欲以什葉伊斯蘭理念來建構對外關係相關。本文由伊斯蘭順尼與什葉的千年之爭談起，並以宗教和地緣政治與戰略的角度來探討「什葉新月」(the Shia Crescent)勢力的崛起與擴張，以及伊朗如何透過「什葉新月」的建構來突破外交上的困境。

貳、「什葉新月」的崛起：順尼與什葉之爭

伊斯蘭的順尼與什葉之爭可溯自先知穆漢默德 (Muhammad) 於 632 年過世後，存在於伊斯蘭世界中關於穆聖繼承人的爭議。千百年來，順尼與什葉穆斯林之間為此曾發生過無數的爭鬥，其中亦不乏許多的流血衝突。關於穆聖繼承人的問題，順尼伊斯蘭認為凡遵守先知行誼，且由伊斯蘭共同體決議選出者皆符合先知繼承人的資格，然而什葉伊斯蘭則主張，唯有先知的堂弟和女婿阿里，以及阿里的後世子孫才具有擔當「伊瑪目」(Imam) 領導伊斯蘭世界的資格。現今，伊斯蘭世界約有 10 億 6 千萬人口，其中信奉順尼伊斯蘭者約佔八成五至九成，而信仰什葉伊斯蘭者則僅佔一成至一成五的

比例。因此，什葉伊斯蘭在人口分佈上是絕對的少數，長期以來遭受順尼伊斯蘭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打壓。位處阿拉伯半島上的沙烏地阿拉伯因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又是兩大聖城麥加與麥地納的所在國而成為順尼伊斯蘭的共主，而國民九成以上為什葉伊斯蘭的伊朗則被公認為是什葉伊斯蘭的代表。1979 年的伊朗革命被什葉穆斯林認為是追求和實踐伊斯蘭理念的重要里程碑。

伊朗革命後，順尼與什葉伊斯蘭由最初的穆罕默德繼承人之爭，發展成為兩派在中東地區爭奪領導地位之爭，亦可視為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權力之爭。近期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新月」(the Shia Crescent) 勢力更在亂世之中趁勢而起，試圖擴張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對於順尼阿拉伯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約旦）而言，「什葉新月」的存在儼然已成為國家安全，以及政權安全 (regime security) 重大威脅。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 (King Abdullah II) 在 2004 年便曾對「什葉新月」的成型提出警訊；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儲穆罕默德薩爾曼 (Muhammad Salman) 更於 2016 年 1 月以「什葉滿月」(a Shia full moon) 來形容伊朗和什葉伊斯蘭對於阿拉伯世界的威脅與挑戰。

所謂「什葉新月」主要包括伊朗、伊拉克、巴林、敘利亞、黎巴嫩和亞塞拜然，地理範圍則涵蓋了波斯灣、地中海東岸，以及裏海的西岸。

其中，伊朗和伊拉克兩國除蘊藏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在地緣戰略上亦有控制波斯灣和荷姆茲海峽的戰略優勢，具備影響國際重要能源自由輸送的能力。敘利亞因為西臨地中海，在地理位置上控制了伊朗和伊拉克等海灣國家能否將重要能源透過陸路運輸的管道送往歐洲大陸。是故，若以地緣戰略的角度分析，則不難理解

順尼阿拉伯國家對於「什葉新月」勢力的憂慮，以及伊朗欲透過「什葉新月」的建構來達成確立其區域強權地位，並影響中東事務的政治目的。

參、「什葉新月」的建構：伊拉克

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執政時期，美國在中東地區長期以來所維持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秩序遭到破壞，亦即確保中東地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成為區域的霸權，主宰並影響美國在二戰結束之後於中東地區所建立的戰略均勢。

在伊拉克戰爭前，受制於順尼伊斯蘭的海珊（Saddam Hussain）政權，什葉伊斯蘭勢力始終未能延伸至阿拉伯半島及海灣地區，但牽制伊朗勢力的海珊政權卻在美伊戰爭中被美、英聯軍所推翻。在美國支持下，戰後的伊拉克是由佔國民多數的什葉穆斯林來主導成立新政府與戰後的重建工作，且新政府的主要領導人亦多由什葉穆斯林出任。伊朗便是利用美伊戰爭和伊拉克戰後重建的契機，成功地突破順尼伊斯蘭的封鎖，將什葉伊斯蘭的勢力擴展至伊拉克境內，並逐步實踐「什葉新月」的地緣戰略構建。然而，伊朗能成功將勢力拓展至阿拉伯半島和海灣地區，實際上經歷了一段非常漫長的歷程，這段漫長歷程其實記述了中東國家及其他行為者，如：美國、英國和共產蘇聯，在區域內所進行的合縱連橫與戰略佈局，時間橫跨了冷戰及後冷戰時代。

1960年代末期，英國正式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中東地區的經略政策。面對英國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美國取而代之，轉而積極介入中東事務。在冷戰的背景之下，美國在國際上採取戰略圍堵（containment）共產蘇聯的策略，而所謂「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 便在 1970 年代被華府政治菁英視為主要的中東政策。「雙柱政策」強調美國應同時維持與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朗的雙邊關係，目的在遏制蘇聯共產勢力侵入中東阿拉伯半島和海灣地區，並進而控制國際原油的供應和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

然而，「雙柱政策」最終因 1979 年伊朗革命而以失敗告終，政策立場親美的巴勒維國王在革命中被推翻，流亡海外。伊朗革命之後，美國駐德黑蘭使館的人質危機進一步使得美、伊兩國關係急轉直下。美國在 1980 年 4 月正式終止與伊朗的外交關係，並在兩伊戰爭（1980-88）中選擇支持伊拉克。美國支持伊拉克，一方面因為人質危機對伊朗的敵意難消，一方面則是擔心伊朗將會輸出革命，威脅阿拉伯半島上親美的順尼伊斯蘭政權。除美國之外，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約旦、埃及和大部分的西方國家皆在戰爭中對伊拉克提出援助。伊朗和伊拉克在 8 年戰爭中付出慘痛代價，最後在聯合國的介入和調停下，雙方衝突才漸趨緩和。

美國在 1990 年代重新調整中東政策，以回應第一次波灣戰爭後的中東新局勢。柯林頓政府指出在後冷戰時代，由古巴、北韓、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亞代表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s) 將取代過去的蘇聯，成為國際社會的新威脅。為處理伊朗和伊拉克問題，美國政府提出所謂「雙向圍堵」(dual containment) 政策。新政策除強調美國應結合國際社會之力對於伊朗和伊拉克進行制裁之外，亦應該同時加強對於前者的「交往」(engagement) 和對後者進行「政權移轉」(regime change) 的計畫。

美國與伊朗的「交往」計畫強調雖然兩國自伊朗革命和人質危機後便陷入外交僵局，但國際社會的壓力仍然能夠迫使伊朗調整對外的政策，如：支持黎巴嫩真主黨 (Hezbollah) 等特定恐怖主義團

體和發展核武器等；同時，兩國官員的直接對話，以及教育、文化的交流，亦有助於化解彼此濃厚敵意。除此之外，伊朗在 1997 年選出的新總統哈塔米（Muhammad Khatami）亦向美國釋出善意，表示有意修正對美政策，以換取美國和歐盟國家解除對伊朗實施的經濟制裁和封鎖。

伊朗對美政策轉向在美國國內出現了新論述。柯林頓政府停止稱呼伊朗為「流氓國家」或「恐怖主義國家」（terrorist state），改稱其為美國所「關切的國家」（state of concerned），並表示已做好隨時和伊朗官方進行對話的準備。惟受制於兩國內部各自的壓力，美伊雙方始終未能在進入千禧年之際達成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伊朗仍舊遭受美國和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

2001 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不僅影響了國際局勢走向，亦影響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和戰略的重組。在全球反恐聲浪中，小布希政府發動代號「持久自由」（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行動，一舉推翻了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繼而推動伊拉克戰爭，成功推翻長期統治伊拉克的海珊政權。戰後取代順尼派海珊政府的是佔伊拉克國民大多數的什葉伊斯蘭政府，新政府重要人事任命亦多由什葉穆斯林出任。基於同是什葉穆斯林的宗教認同與歸屬，伊朗成功掌握伊拉克戰後重建的契機，突破長期以來順尼伊斯蘭對於什葉伊斯蘭的打壓和封鎖，並將什葉伊斯蘭勢力擴展至阿拉伯半島和海灣地區。然而，戰後的伊拉克政局並不穩定，什葉伊斯蘭政府未能在行政上有效治理伊拉克，又排除部分順尼穆斯林參與新政府的防衛整合計畫，引來伊拉克境內順尼穆斯林的極度不滿。美國軍事佔領期間，除英、美聯軍屢遭叛亂團體伏擊的事件之外，順尼、什葉的武裝衝突亦未曾停歇，其中不乏有什葉伊朗和順

尼蓋達組織伊拉克分支（Al Qaeda in Iraq, AQI）的代理人衝突。

2009 年歐巴馬政府為反恐戰爭重新定調，將反恐戰場限縮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兩國，並於 2011 年 12 月將美軍戰鬥部隊盡數撤出伊拉克。美軍撤離後的伊拉克陷入嚴重的內戰，凋敝的伊拉克為暴力極端主義（violent extremism）提供滋長的有利環境。順尼伊斯蘭恐怖主義團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便是利用伊拉克內戰的機會趁勢而起，在伊拉克境內攻城掠地，不僅攻擊伊拉克政府軍，亦殘害無辜的什葉穆斯林居民。

為阻止伊斯蘭國對於伊拉克境內什葉穆斯林的迫害，伊朗與美國所組織的反極端主義聯盟站在同一陣線，除了對伊拉克政府軍提供軍事的諮詢、顧問外，精銳的共和衛隊（Revolutionary Guards）亦實際參與戰鬥的任務，並與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民兵組織，及伊北的庫德族敢死隊（Peshmaga）結盟，共同打擊伊斯蘭國。雖然伊朗素來與阿拉伯半島上的順尼阿拉伯國家不睦，但在伊斯蘭國極端主義的議題上，伊朗卻和順尼阿拉伯國家共同譴責極端主義所採取的暴力行徑。畢竟一個受順尼極端主義控制的伊拉克並不是伊朗所樂見的，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境內對什葉穆斯林的迫害已嚴重威脅伊朗所推動且正在成型中的「什葉新月」同盟。

肆、「什葉新月」的建構：敘利亞、黎巴嫩

除伊拉克外，敘利亞和黎巴嫩也是「什葉新月」勢力成型的重要關鍵。2010 年突尼西亞發生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運動，總統班阿里在革命運動中被推翻，流亡沙烏地阿拉伯。這股追求民主化的風潮自北非一路向東吹往阿拉伯半島，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敘利亞、巴林和葉門皆受到革命風潮的影響。敘利亞的阿拉伯之春運

動，最初僅是民眾單純示威抗議，但在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府採取強制手段鎮壓示威群眾後，遂逐漸演變成大規模的反政府武裝衝突，敘利亞隨即陷入嚴重內戰。和伊拉克問題類似，敘利亞內戰顯示中東地區獨特又複雜的種族、宗教和地緣戰略因素，亦涉及周邊國家和強權國家在區域內進行的政治角力。對伊朗而言，阿薩德政權延續與否的問題，將實際影響「什葉新月」勢力能否持續擴展政治版圖，並建立連接波斯灣通往地中海東岸的戰略紐帶。

敘利亞西面地中海，地理位置控制阿拉伯半島銜接土耳其，並通往歐洲大陸的陸運要衝。在政治上，敘利亞長期由阿薩德家族統治。雖然敘利亞七成的國民為順尼穆斯林，但政治上卻由僅佔人口比例不足一成五的什葉伊斯蘭分支阿拉維派（**Alawi**）統治。阿拉伯之春、內戰和極端主義伊斯蘭國的問題重創敘利亞的政治團結，武裝派系和各種民兵組織散佈於各行政區內。

在敘利亞內戰中，阿薩德政府所領導的政府軍獲得俄羅斯和什葉伊朗的堅定支持，而反政府勢力則是得到美國、西方國家和順尼阿拉伯國家的援助。自冷戰時代起，俄羅斯和敘利亞便維持緊密的外交關係，兩國人民來往密切，求學、旅遊和通婚的情況亦相當普遍。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對於中東事務的影響力不如以往，又因 2014 年的克里米亞問題遭受美國和西方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敘利亞問題提供俄羅斯重返國際政治舞台，展現大國影響力的機會。同時，敘利亞境內的塔圖斯（**Tartus**）和拉他基亞（**Latakia**）海、空軍基地也攸關俄羅斯在中東與阿拉伯半島的地緣戰略利益，是影響俄羅斯干預地中海和中東事務的關鍵。

和俄羅斯相似，伊朗在敘利亞亦具有地緣政治和戰略利益。伊朗除和阿薩德政權同屬什葉伊斯蘭陣營外，透過敘利亞，伊朗可以

持續對黎巴嫩境內的真主黨提供援助，協助其對抗以色列的軍事威脅。真主黨成立於 1982 年的黎南戰爭後，雖然真主黨在黎巴嫩是合法的政黨，卻因堅持保有武裝對抗以色列的權利而被以色列、阿拉伯聯盟（the Arab League）、美國和大部分的西方國家列為恐怖主義團體。伊朗長期以來和以色列在中東問題（如：猶太復國主義、巴勒斯坦問題、黎南軍事佔領）上採取對立的態度，而伊朗飽受爭議的核子發展計畫，亦被以色列視為是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在伊朗與以色列的衝突、對抗中，黎巴嫩真主黨和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始終堅定支持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朗也在阿薩德總統的政權保衛戰中對阿薩德政權提供軍事上的援助。透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涉入敘利亞和黎巴嫩的事務，伊朗成功利用什葉伊斯蘭的影響力，達到構建「什葉新月」的政治目的。

伍、結語

伊朗過去數十年來的對外關係，可以視為是一部在強敵環伺下求生存和發展的歷史。在 1979 年的革命之前，伊朗和美國維持著友好、穩定的雙邊關係，因此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上有所謂的「雙柱政策」。1979 年革命後，美、伊兩國關係驟變，美國單方面終止與伊朗的外交關係，而伊朗強硬的反以色列立場，以及支持特定的恐怖主義團體（如：真主黨），和堅持不放棄核子研發計畫的態度皆使得伊朗長期遭受美國和歐盟國家的制裁與外交孤立。美、伊關係雖在 1990 年代美國「雙向圍堵」的政策思維下出現轉機，但在互信不足的條件限制下，伊朗終究未能突破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封鎖。宗教上，伊朗雖與周邊大多數的阿拉伯國家同樣信奉伊斯蘭教，但卻因為順尼、什葉之爭，而被順尼阿拉伯國家所抵制。順尼阿拉伯國家

除在宗教上本就不信任什葉伊斯蘭，更擔心什葉立國的伊朗將進一步對外輸出革命，威脅自身政權的延續與發展。因此，伊朗在阿拉伯半島上僅有敘利亞和黎巴嫩真主黨等少數政治上的盟友。

伊朗的外交困境在 2003 年的美伊戰爭之後再次出現轉機，反伊朗的海珊政權在戰爭中被推翻，伊拉克的什葉穆斯林主導伊拉克的戰後重建工作，透過實際參與伊拉克的戰後重建，以及協助伊拉克安全部隊掃蕩順尼伊斯蘭恐怖份子和伊斯蘭國，兩國關係進而獲得改善。什葉伊朗勢力成功突破順尼阿拉伯國家的封鎖，推進至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並向北延伸至地中海東岸的敘利亞和黎巴嫩。

面對「什葉新月」勢力的逐步成型和建構，無怪乎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兩國領袖分別在 2004 年及 2016 年對「什葉新月」勢力的威脅提出警告。目前，伊朗雖看似突破國際社會和順尼伊斯蘭的地緣封鎖，「什葉新月」勢力未來能否持續影響中東地區地緣政治，仍舊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若伊拉克什葉伊斯蘭政府無法有效治理國家，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未能安然度過政權的保衛戰，以及真主黨未能透過選舉制度壯大在黎巴嫩的勢力，甚或是伊朗自身無法妥善因應國際社會對其核子發展計畫的疑慮，那麼「什葉新月」的勢力將再度面臨國際和區域內順尼阿拉伯國家的壓制。